

清代西安、兰州和太原的书院分布与选址

刘景纯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城市书院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城市书院在全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清代西安、兰州和太原三个省会城市书院的时空分布及其选址特征的研究, 以揭示三个城市之间书院文化差异的一个方面。清代三个省会城市书院的建立和发展有时段的差异, 也有重心的变化。书院的选址和分布格局在观念、发展道路以及格局模式等方面有同有异。

[关键词] 西安 兰州 太原 书院分布 书院选址 清代

[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05(2006)03-0094-08

[收稿日期] 2005-09-05

[基金项目]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04F004Z)成果。

[作者简介] 刘景纯(1965-), 男, 陕西礼泉人, 历史学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和研究的园地。它始见于唐代, 最初是官方藏书、校书或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聚徒讲学”的书院形成于五代末期, 后经宋元明清1000多年,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至清代书院数量已发展到2000余所, 数量大大超过前代。^① 在长期的发展中, 书院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 一是自元代以后日益明显的官学化; 二是由早期建在幽静的山林、形胜之地转向在城镇择地建置, 从而造成城镇书院的日渐发展。这种情况发展到清代, 一方面书院官学化之路基本完成, 书院本身和学校几乎没有什么两样。^② 另一方面是城镇书院日渐占据了书院的主导地位。书院的官学化前人研究的较多, 但关于城镇书院则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笔者不揣浅陋, 拟选取黄土高原地区清代的三个省会城市, 就其书院的时间分布、选址及其变化的特点加以比较论述, 以期反映三个城市文化差异的一个方面。不妥之处, 请批评指正。

一 书院的时间分布及其特点

西安、太原和兰州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的三个省会城市, 是这一地区三个行政级别最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安城在元代首次出现书院, 是三个城市中书院出现最早的城市。《元史》曰: 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五月, “戊寅, 京兆为故儒臣许衡立鲁斋书院。降玺书旌之”^③。乾隆《西安府志》说: “咸宁(县)旧有鲁斋书

①季羨林:《中国书院词典·序言》, 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词典》,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年8月。马铺认为, “清代实际存在的书院大约在4000所左右”。(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马铺著《中国教育制度史》卷5,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年3月, 第209页。)

②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年3月, 第4-9页。

③《元史》卷25, (北京)中华书局, 1976年4月, 第565页。

表 1 清代三个省会城市的书院

省会	书院名称	城中分布	备 注
西安	正学书院	约在今西安城西大街中段，路南正学街旧省图书馆南院处。	元建，入明百余年废弃，明弘治九年（1496 年）再建，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并入关中书院。
	关中书院	今西安城南门内东侧西安师范学校处。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至康熙六十一年书院为督学使署，同年督学使署迁三原，书院恢复。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改为师范学堂。
	养正书院（道光时易名崇化书院）	今西安柏树林街东卧龙寺巷。	清嘉庆七年（1802 年）并咸宁、长安两县春明、青门两学舍而建。道光时易名崇化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 年）迁于旧清军同治署偏东，位置约在今西安东厅门路北西安高级中学东侧。
	鲁斋书院	今西安东关长乐坊路北市二十二中学校处。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 年）建，明中期渐废，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重建。
	少墟书院	今西安西关正街西段路北新民巷附近。	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在青门学舍旧址附设的书院。
太原	晋阳书院（原称三立书院，雍正十一年易此名）	今太原市公安局所在地。	清顺治十六年（1659 年）前，为沿袭明书院，称“三立书院”，明末清初已荒废。旧址在今旧城街一带。顺治十七年（1660 年）迁移现址。雍正十一年（1733 年）更名为晋阳书院。
	令德书院	今山西省实验中学所在地。	清光绪九年（1883 年）创办。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二十六年（1900 年）被天主教侵占为临时教堂，停办。二十八年（1902 年）被山西大学堂取代。
	崇修书院	旧址在清太原府治东南桥头街。	清同治初建，光绪元年（1875 年）改建府学。
兰州	兰山书院（初名正业书院）	在省会新关路北，今秦安路北，兰州第三中学所在地。	清雍正二年（1724 年）建，称正业书院。雍正十三年（1735 年）改建为兰山书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改为师范学堂。
	五泉书院	在省会后街，今滨河路南贤后街东口北端，即市委楼旁。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建。
	皋兰书院	在旧县治东南曹家厅地，今曹家厅小学所在。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建，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改建为高等小学堂。
	求古书院	在省会贡院巷，今贡院巷小学及城关区教育局所在地。	清光绪九年（1883 年）建。

资料来源：《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续修陕西通志稿》；光绪《山西通志》；[民国]张维《蘭州古今注》，

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24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季啸凤主编《中国书院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西安地方志馆·张永禄主编《明清西安词典》“学校书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张德一、贾莉莉编著《太原史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蒋制心、张嘉馥《浅谈清代兰州的书院》,《兰州学刊》,1981年第1期。

院。《元史·仁宗纪》:延祐元年(1314年),京兆为故儒臣许衡立。《续文献通考》:在县治东北,今废,其地尚有名书院坊。”^①太原在明代万历年间建立“三立祠”书院,兰州在明代景泰、成化年间有“容思书院”。(见后文)反观这一地区的其它城镇,如陕西蓝田县、河南府(洛阳)等在唐宋时期就有书院存在。^②元代的书院发展向北方地区推广,今山西省境内就分布有15所书院^③,其中一些书院建在府州县城镇及其近郊。这些史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书院形式的讲学和研究活动在这三个城市的发展是相对较晚的。清代,书院在黄土高原地区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三个省会城市的书院数量比以前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就其发展看,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请看表1。

如果将前后相继且位置基本不同的不同名称的书院当作一个书院,那么单纯从书院数量看,清王朝时期的西安有过5所书院,居三个省会城镇的首位。其次是兰州有4所,太原有3所。从书院存在及其运行时间上看,西安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以前的57年,是关中书院和正学书院两个书院并存时期。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20年,因“督学使”占据关中书院,关中书院停办,这一时期西安只有一个正学书院。1722年“督学使”迁居三原,关中书院恢复。也就在这一年正学书院并入关中书院。这样,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到嘉庆七年(1802年)的80年间是一个关中书院存在时期。嘉庆七年(1802年)养正书院建立,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鲁斋书院建立前的83年间,关中书院与养正两个书院并存。鲁斋书院建立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5年时间,关中、养正和鲁斋书院并存。光绪十六年少墟书院建立,此时西安城中已是四个书院并存,但大约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根据这种情况,清代书院存在时间分布是:1个书院时期100年;2个书院时期140年;3个书院时期5年;4个书院时期在1890年以后。

关于兰州的书院,民国时期张维先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记述,他说:

“古者学必于先师之庙,谓之庙学。宋时始有书院,元明以来其制大备,为师儒讲学之所。清制:省府州县皆设书院。而兰州有书院四。省立者二:兰山书院,在新关路北,始于雍正十三年;求古书院,在贡院巷西,始于光绪九年;其山长必延宿学而由进士出身者。肄业之士,各县举贡生员皆得与焉。府立者一:五泉书院,即今五泉图书馆地。县立者一:皋兰书院,在曹家厅,今为小学。其山长得于举人以上延用。肄业之士以兰州府与皋兰县生童充之。而兰山书院声誉最盛,山长如牛运震、吴镇、张澍、吴可读、张国常诸人,皆一时硕学巨儒,善教流被,蔚为士风。常欲考其学术门径及师友渊源所及,以为金城书院记,苦病未能也。”^④

这段话“宋时始有书院”,自然是不正确的,但所述兰州的书院则是不错的。不过,据《甘肃通志稿》,清雍正二年(1724年)巡抚卢询已经在明代红花园地建有“正业书院”^⑤,这一书院张维没有述及。加上这个书院,清代兰州城曾经

①[清]舒其绅等修、严长明等纂:《西安府志》卷19,学校志,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影印本,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13号,(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57年。

②陕西蓝田县在唐代建有“瀛州书院”,分布在县治南,是唐代学士李元通所建。宋代吕大临在该县县治北5里“芸阁寺”(俗称吕氏庵)讲学,实际上也是一所书院。洛阳在唐代有丽正书院,宋代有同文书院、龙门书院和伊皋书院。

③邓洪波:《元代书院及其发展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年,第6期。

④[民国]张维:《兰州古今注·书院》,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24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10月,第38-39页。

⑤《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28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10月,第2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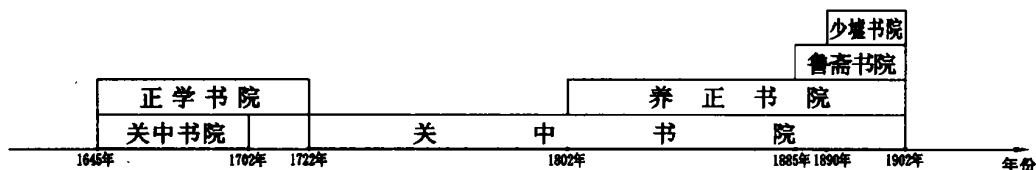


图1 清代西安书院存在时间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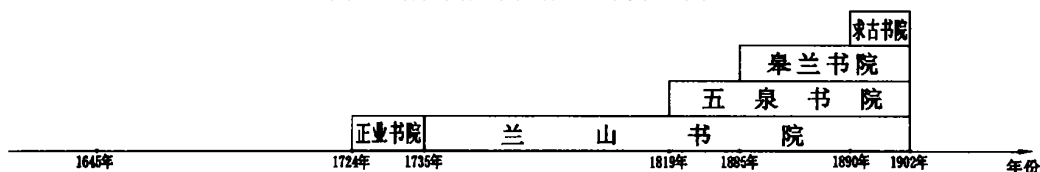


图2 清代兰州书院存在时间示意图



图3 清代太原书院存在时间示意图

有过5所书院。从书院存在时间看，正业书院最早，建于雍正二年（1724年）。从此时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共95年，是1个书院时期。嘉庆二十四年，五泉书院建立，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计23年，是2个书院时期。道光二十二年，皋兰书院建立，到光绪九年（1883年），计41年，是3个书院时期。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经历了同治初年的回民起义，书院可能停止运行约十年左右。张国香《修理经费并肄业诸生乡试盘费碑记》说五泉书院的情况：“同治壬戌（1862年），逆回不靖，蔓延郡属，横经之士，日辗转于颠沛流离中，而书院虚无人矣。厥后，征西车马，雾集云屯，骄弁悍勇，据为邸馆。桃李为薪，窗扉尽废，惟余数楹破厦，四壁残碑与蓬蒿相掩映而已。”“戊辰之岁”（1868年）后“二载”，才为修理书院筹费。^①其它书院的情况虽未见载，估计也停办了。因此，其实际运行时间约30年。光绪九年（1883年），求古书院建立，此后便是4个书院时期。这样，1个书院时期的实际存在时间是95年，2个书院时期的存在时间是23年，3个书院时期虚算是41年，实际存在时间约30年。4个书院时期在光绪九年（1883年）以后。而在清顺治二年（1645年）到雍正二年（1724年）之间的80年间，属于无书院时期。

太原，按《中国书院词典》的说法，明代曾有一个书院叫“三立祠”或称“三立书院”，明末清初在战乱中荒废，直到清顺治十七年（1660

年）9月才在城南另建书院，仍取名“三立书院”。这样，从顺治二年（1645年）清人占领山西到顺治十七年的15年间，太原城实际上是没有书院时期。顺治十七年三立书院重建，到同治（1862-1874年）初年以前，约200余年，太原是1个书院时期。从同治初年崇修书院的建立，至光绪元年（1875年）崇修书院改建为府学约10年时间，是2个书院时期。光绪元年（1875年），崇修书院改建为府学，到光绪九年（1883年）“令德堂”或“令德书院”建立前，太原又是1个书院时期，时间为8年。光绪九年（1883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17年又是2个书院时期。光绪二十六年，令德书院因为被天主教堂强占为临时教堂而停办，太原又变为只有1个“晋阳书院”的时期，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间是2年。这样，1个书院时期历经三个阶段，时间计约210年。2个书院时期历经二个阶段，时间计约27年。

表2（见下页）的意义是什么？它至少告诉我们，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书院在3个省会城市的存在和运行时间最长的是西安，其次是太原，再次是兰州。结合前面的分析，西安书院数量不但居于三个城市的首位，其存在和运行时间也居首位。原

①《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28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10月，第229页。

表 2 清代三省会城市书院存在时间

书院数 省会	1	2	3	4	合计
西安	100 年	140 年	5 年	12 年	257 年
兰州	95 年	23 年	30 年	19 年	167 年
太原	210 年	27 年			237 年

说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但各省改制时间不一，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表中最后年限统一截至到 1902 年。

因在于，太原是在顺治十七年后才有书院重新设立，晚于西安 15 年，而兰州直到雍正二年（1724 年）才有书院，晚于西安 80 年；（2）1 个书院时期，太原长达 210 年，西安是 100 年，兰州最少，也有 95 年。这种情况说明，截至到 1902 年，清代太原在书院的发展上长期是最为稳定的，也是在书院数量发展上最少的。在三个城市中，1 个书院时期的时间在城市书院时期的时间最长的是太原，占 88. 6%，其次是兰州占 56. 9%，而西安 1 个书院时期的存在时间只占 38. 9%，所占百分比最低。前两者的时间均超过一半，而后者则不足 40%；（3）2 个书院时期，在时间分布上有间断，但总和是西安最多，长达 140 年，占西安书院时期整个时间的 54. 5%。兰州和太原的各自时间分别为 23 年和 27 年，分别占各自书院时期时间的 13. 8%和 11. 4%。这种时间分布的百分比表明，截至到 1902 年，西安 2 书院时期在清代西安书院时期的时间不但最长，在 3 个省会中也是最高的；（4）3 个书院时期，太原没有，其他两个城市也出现的较晚，兰州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开始，西安则从光绪十一年（1885 年）开始，在这一点上，兰州要早于西安 43 年。同时，兰州 3 个书院时期实际存在时间是 30 年，约占其书院时期的 18%，而西安仅有 5 年，约占其书院时期的 1. 9%。这就是说，从 1842 年到 1885 年这 43 年时间里，兰州的书院数量在三城市中是最多的，其存在时间也最长。从这一点上讲，这一时期书院发展的重心在兰州；（5）4 个书院时期，太原没有，其余两个城市书院的存在时间也都不长。但兰州自光绪九年（1883 年）开始，西安从光绪十六年（1890 年）开始，西安晚于兰州 7

年。与 3 个书院期一样，在这 7 年的时间里，兰州以 4 个书院，依然位居三个城市之首。

以上史事表明，雍正十一年（1733 年）清政府诏令各省设立书院前，即在清代前期的抑制书院政策^①背景下，黄土高原地区的这三个省会城市都有书院，西安 2 所，太原 1 所，兰州 1 所。在诏令各省设立书院政策下达后，也就是政府政策明确支持各省设立书院后，这三个城市并没有掀起建立书院的高潮，只是对原先书院的延续、更名或改建而已。不但如此，西安的书院由康熙四十一年前的 2 个书院，在康熙六十一年并为 1 个书院的情况，^②在“诏令”下达以后也没有得到恢复。包括太原和兰州在内，这种 1 个书院的情况此后还存在于七、八十年，直到 19 世纪初才有所改变，而太原更晚，迟至 19 世纪后期才有变化。有人根据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的统计认为，“清代书院比以前各代都多，乾隆时期最盛”^③。也就是说，清代乾隆时期兴办的书院最多。但在本文所谈的三个省会城市却未见乾隆时期的建树，而是更多的集中在光绪年间。因此，整体上说黄土高原地区这三个省会城市的书院教育和研究活动在 19 世纪前并不很发达，也没有与全国的发展趋势密切合拍。直到第

①季羨林：《中国书院词典·序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2 页；章柳泉著：《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 3 月，第 34 页。

②章柳泉先生说，雍正十一年上谕下达后，各省省城，都办起了一二个较大的书院。其中引《续会典事例》说有山西晋阳、陕西关中、甘肃兰山书院。（见章柳泉著《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 3 月，第 35 页。）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编著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年 12 月，第 92 页。）也持此说。我认为，说甘肃兰山书院没错，但说其余两个书院是“上谕”下达后办起的，则是不大符合史实的。在这一点上，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马辅著的《中国教育制度史》第 5 卷里说“遵照世宗的诏令，各省省会相继建立了督抚控制的省会书院”，其中列述了上述三个书院。（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年 3 月，第 205 页。）这一说法强调“建立了督抚控制的省会书院”，是较为严密的科学说法。

③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 3 月，第 37 页。

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乃至 19 世纪晚期,其发展才逐渐加快,这时西安、兰州都已发展为 4 所书院,太原也有过 2 所书院。

二 书院选址及其特征

古代书院选址以明代书院官学化大发展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选址,如王风雷讲元代书院所说:“元代的文人墨客、地方官吏和有钱人在建造书院时,承袭了前代的传统,把书院都建立在风景优美,远离城乡的僻静地方。”^①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不完全对,但当时绝大多数书院选择在远离城镇的“名区胜地”则是事实;后期,随着书院官学化的快速发展,书院在城镇中日渐发展。虽然这一进程自元代已经开始,但在明代以后才日渐占到统治地位^②。至清代,“远离城镇”的书院已寥寥无几了。总观书院在城镇的分布,约有两大类,即城内(包括城关)和城外。城内分布主要有三种类型:(1)近政治中心(府县署)型;(2)近文教中心(文庙、学宫、儒学、考院等)型;(3)散处型。由此或构成相应的单元组合,或孤立独处,形成城市内部结构和城镇意象中的特征性区域或个体印象。清代西安、太原和兰州三个城市中,书院是如何在城中分布的?其所在街域的文化要素组合有什么不同?这是下面我们要说明的问题。

清代西安城市书院的分布以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光绪十一年(1885 年)以前,书院分布在城内;光绪十一年(1885 年)以后所建书院均分布在城关。关中书院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是布政使等官员为关学名儒冯从吾讲学所建的官办书院,地址在府治东南,与文庙、咸宁县学、长安县学等近邻。而养正书院,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后的崇化书院,在成长考院东侧,其西南即文庙等学校教育中心地,因而总体上与之连为一体,形成群体,组合为清代西安城南门里东侧集中分布的文化教育中心。正学书院建于元代,初建之地,据说是宋代关学祖师张载“倡道之地”,但到明宏治九年(1496 年),该遗址已荡然无存,所以当时提学杨一清,“卜地重建”。^③这次选择的地方是今西大街,旧陕西省图书馆南院所在地。该书院地近巡抚部院、府署,又有文昌宫、长安县署等,从而构成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与文

庙为中心的文化中心相比,这一文化中心的规模,包括文化教育及其相关机构要少一些,中心性自然也要差一些。但由此造成书院布局在结构上呈现二元中心的特征。当然这样的结构特征并不是建造者的规划使然,只是一种客观反映而已。这样的结构,后来因正学书院并入关中书院而结束。光绪十一年(1885 年)和十六年(1890 年)先后建立的鲁斋书院和少墟书院分列东关和西关,改变了书院分布于城中的格局,实际上形成了书院布局的西关、城中和东关的三元格局。这种布局的出现与东、西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日益增多的需要有关,但它并不能反映书院选址在思想上的解放性特征。因为这两个书院的选址依然沿袭了元代以来的选址原则和精神,即于“先儒过化之地,明贤经行之所……并立为书院”^④。根据黄嗣东《重建鲁斋书院记》,鲁斋书院选择在现在西安市二十二中学校所在之地有二个原因:一是元代有个鲁斋书院,《通志》云在咸宁县东,是为元代大儒许衡建造的。当时书院遗址已经湮废;二是《咸宁县志》记载,城东关有春明学舍,嘉庆三年(1798 年)并入养正书院,春明学舍废弃。后来邑人王纯敬捐资,在此地建立义学。光绪三年(1877 年),又有李蓉锐,图谋兴复学舍,先后建了祭祀孔子的大殿、文昌宫等,但因费用不足而停止。^⑤少墟书院建在城西门外,因该处旧有明朝

①王风雷:《元代书院考遗》,《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 年第 4 期。

②近人曹松叶统计:明代书院约有 1200 余所,其中民办的 184 所,约占总数的 15%;官办的 828 所,其中地方官办的有 635 所,督抚办的 135 所,京官办的 58 所,总计约占总数的 60% 以上。(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十集,第 111-115 期,1929 年 12 月-1930 年 1 月。)其中官办书院大多设在城镇。

③以上参见[清]舒其绅等修、严长明等纂:《西安府志》卷 19,学校志,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影印本,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 313 号,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 57 年,878-881 页。

④《元史》卷 81,(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 4 月,第 2032 页。

⑤[民国]宋伯鲁等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7,学校二,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 7 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 年 10 月,第 148 页。

大儒冯从吾“专祀”，旁边又有青门学舍旧址，后经战乱被毁，此次重修祠祀，并附设书院。^①很显然，这两个书院都是在所谓“先儒过化之地”上修建的，都不是从书院布局上考虑的。因而就谈不上书院布局在整体布局思想上的变化。据此我认为，至晚清时期，西安的书院布局依然继承了元代以来的布局或选址观念，没有什么突破的痕迹。

清代兰州的5所书院，以正业书院最早，兰山书院庚续其后，前后相承，分布于城东关。不过，明景泰、成化间，东关曾有个“容思书院，是当时大儒段容思先生讲学之所。容思先生学事见载于黄宗羲《名儒学案》，门人弟子众多，一时边陲皋兰儒学，颇为世人称道。至清时，萧光汉“学以容思为宗”，梁济瀟“以私淑容思”，二人都“课士讲学”，阐扬“容思”之学，从而造成“容思之学大盛于兰”的局面。^②应该说，这是此后兰州城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因素。入清79年后，正业书院在明“红花园”地建成。11年后，兰山书院由正业书院改建而成，^③分布于兰州城东关，这些应该是受了“容思书院”分布的历史的影响。五泉书院，在城内中部北端，即今城关区贤后街东口北端，北靠滨河路，东邻兰州市委大楼。从位置上看，它靠近总督署和关帝庙，是一所与政治中心和民间宗教中心组合在一起的文化教育中心。它虽然借用“五泉”为书院名号，却与五泉山清净之地没有任何关系。皋兰书院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选择旧“右营参将废署”改建而成的，位置在城内东南隅。光绪九年建立的求古书院在其北不远处。二者也都分布在城内。这3所书院所在之地都不是所谓的“名儒过化之地”，也没有文庙、府学、县学的凝聚性吸引力。因此，清代兰州城的书院分布有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早期的两个书院，前后相因，都分布在城东关；后起的三个书院都分布在城内。从时间分布看，先有城关分布，后有城内分布；后起的三个书院，两个集中分布在城内东南一隅，一个分布于城内中部北端。由此形成城内二元，城关一元的三元结构和三个中心的分布格局。在这一点上，它和西安走的是一种相反的道路，即兰州是由城外到城内的发展道路，而西安是由城内到城外的发展道路。二是后起的书

院的选址不再受旧的“先儒过化之地”的观念的束缚，也没有趋向儒学所在地选址，而是就废弃旧官署之地改建，或在官署附近就便择地而建。这也是与西安后期书院择址的观念所不相同的。这一点反映了兰州书院选址在思想和观念上已经突破了旧的思想，初步实现了选址思想的解放。当然，这样的解放不能认为是彻底的，而只是一种不得已的突破。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城中可能就没有名儒讲学之处，也就没有必要再拘泥了。

太原城的晋阳书院，其前身是“三立书院”，“三立书院”的前身是河汾书院，最早又称晋阳书院。这些都是明代的书院，万历初年废弃。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当时巡抚魏允贞重新兴复书院，建“三立祠”，实即“三立祠书院”。院址在巡抚衙门旧址。顺治十七年（1660年）巡抚白如梅迁移“三立祠”于府治东南侯家巷，即今五一广场东北太原师范学院和市公安局处。“而书院则另设于北门。乾隆十三年（1748年），巡抚准泰以北门逼处阇闾，不免嚣杂，遂移书院于三立祠。”雍正十一年（1733年）易名晋阳书院。^④根据这种情况，从顺治十七年到乾隆十三年之间的88年时间，“三立祠”和“书院”是分离的，三立祠在城内东南隅的侯家巷，三立书院在城北门。若此，则雍正十一年改名的晋阳书院就是在北门的三立书院。改名15年后，才迁到侯家巷的三立祠。从该书院的位置变动看，它经历了从巡抚衙门旧址到北门，由北门再到城内东南隅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书院逐渐远离政治中心和喧嚣嘈杂的经济、

①[民国]宋伯鲁等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7，学校二，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7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10月，第147页。

②[民国]张维：《兰州古今注·书院》，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24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10月，第29-31页。

③《甘肃通志稿·甘肃教育志》，吴坚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28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0年10月，第227页。

④以上参见[清]王轩等纂修：《山西通志》（第11册，单远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4月，第5278-5279页。

社会活动场所的趋向。同时，由于书院坐落在城东南隅，东北不远处就是作为城市文化中心的标志性建筑物文庙，客观上体现了趋向文庙中心地选择建立书院的一种观念。这一点和西安的关中书院、崇化书院的选址观念客观上是一致的。崇修书院，是同治初年在崇善寺废址上建起的一所书院，光绪元年（1875年）因在此地建置府学，书院被迁移到府治东南的桥头街。^①令德书院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巡抚张之洞创办的，地址选择在太原府署西北的“保贤堂”（即今“省实验中学”所在地）。先是光绪九年（1883年），张之洞等在府署后的“保贤堂”招揽生徒，“专治古学”，称“令德堂”，十一年（1885年）建为书院。^②这两所书院的院址选择，应该说在太原书院选址和布局上是一个回归。与以前的趋势有所不同的是，它们都选择在府署所在的政治中心附近，并与府署等机构组合为城内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不同的是，后者初建时利用的是“保贤堂”，又“初假于公所”，^③后来即就便建成了书院；前者虽然也利用了道光年间所建的“崇节堂”，^④但显然是经过选择才迁移于此的。不论如何，二者选址所体现的客观意义是一致的。这两所书院的建立，从结构上改变了太原城书院一

元分布的格局，所出现的二元分布结构，在太原书院布局发展上是一个新的变化。

与西安和兰州相比，太原的书院始终都在城里，没有突破城池的范围，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反映了书院官学化后，教育机构选址的传统，即趋向文庙中心地和城市政治中心的观念的深深影响，但也客观上体现了太原在书院选址和布局观念上不够开放的性征。造成这一特点的直接原因，除过上面谈到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在书院运行时间内，并存书院数量少，也会限制书院选址的思想。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形成了这种长期、稳定的城内书院分布格局。

① [清] 王轩等纂修：《山西通志》（第11册，单远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4月，第5281页。

② [清] 王轩等纂修：《山西通志》（第11册，单远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4月，第5279页。

③ [清] 王轩等纂修：《山西通志》（第11册，单远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4月，第5279页。

④ [清] 王轩等纂修：《山西通志》（第11册，单远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4月，第5281页。

Distribution and Locational Selection of Academy of Learning in Xi'an, Lanzhou and Taiyu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iu Jingchun

(Center for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City academy of learning is the very important part of c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ity academy of learning developed very quickly and widely in our count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hree citie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and locational selection feature of academy of learning in Xi'an, Lanzhou and Taiyu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ere researched in the pape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academy of learning ha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distributional centre also chang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and locational selection feature of academy of learning in Xi'an, Lanzhou and Taiyuan were different in the field of idea, developmental paths and pattern module, but some were similar.

Key words: Xi'an ; Lanzhou; Taiyuan; Distribution of academy of learning; site selection of academy of learning; Qing Dynasty